



朱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第
8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劉國光

經濟論著全集



(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過渡時期的探索 1989—1990 年) 第 8 卷



知識產權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目 录

总量上坚持紧缩 结构上抓紧调整

——在《改革》杂志召开的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9年2月) 1

消除经济过热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

——《中国计划管理》杂志记者专访 (1989年2月) 4

私有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

——《半月谈》记者专访 (1989年2月) 9

经济形势、理论和政策

(1989年2月) 11

紧缩总量 调整结构

——《人民日报》记者专访 (1989年3月5日) 30

对当前经济问题的一些看法

——新华社记者专访 (1989年3月) 32

谈谈目前中国经济的调整

(1989年3月) 36

中国如不坚持紧缩会出现可怕新通胀

——香港中国通讯社记者专访 (1989年4月3日) 41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羊城晚报》记者专访稿 (1989年5月17日) 43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总序

(1989年5月) 48

走出困境的近期对策

(1989年5月) 51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1989年6月) 72

《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序

(1989年6月) 88

利害相权之后的抉择

——《求是》杂志记者专访 (1989年6月) 92

中国四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经济改革的艰辛历程

(1989年6月) 98

“趋同论”的实质是取消社会主义

——《文汇报》记者专访 (1989年8月25日) 117

宣扬“趋同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反映

(1989年9月) 123

划清两种改革开放的界限

——《经济日报》记者专访 (1989年10月) 128

中国的出路仍在于改革

——中国经济路向座谈会发言摘要 (1989年11月) 134

关于当前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

——学习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的体会 (1989年12月16日) 139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

——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国际会议论文 (1989

年12月26日) 160

我看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1989年12月31日) 167

既要治理整顿,也要解决机制上的问题

——在香港《经济导报》召开的中国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1989年12月) 171

在中国工业合作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89年) 175

加大改革步伐,推进治理整顿

(1990年1月9日) 189

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问题

(1990年1月) 192

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关系的若干思考

(1990年2月2日) 197

加强学术交流 推动区域经济研究

——在中国区域经济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1990年2月28日) 204

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当前的调整

——在莫斯科中苏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上所作学术报

告 (1990年2月) 209

中国国有制经济改革的探索

(1990年2月) 222

在治理整顿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思考

(1990年2月) 240

会见台湾教授访问团时的讲话

(1990年5月7日) 256

略论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

(1990年5月) 263

“八五”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

(1990年6月2日) 269

“八五”及“九五”期间中国经济改革大思路

——《改革时报》特约记者专访 (1990年6月9日) 273

略论逐步加大改革分量

(1990年6月) 279

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管理科学院召开的陈云论著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0年6月12日) 287

逐步加大改革分量使之成为“八五”中后期经济工作的中心

(1990年6月) 297

正确认识和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

(1990年6月) 302

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发展

——“八五”时期“稳中求进”的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思路

(1990年6月) 314

治整·改革·发展

——《中国统计信息报》记者专访 (1990年7月23日) 346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我国90年代的经济的发展

——在杭州召开的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0年7月) 350

治理整顿与改革

——《瞭望》周刊记者专访 (1990年7月) 359

总量上坚持紧缩 结构上抓紧调整*

——在《改革》杂志召开的中国改革
向何处去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9年2月)

当前，在治理经济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一个“两难”问题：坚持紧缩，就会加剧资金周转困难，造成流通的梗阻和生产的“滑坡”；放弃紧缩，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就会如脱缰的野马，难以收拾。怎么办？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总量上坚持紧缩，结构上抓紧调整。这个说来并不新鲜，但要真正做到，还需很大的决心，花很大的力气。

其实，这个“两难”问题，我们也不是头一回碰到。1985年采取紧缩政策后，1986年年初就碰上这个问题。那时总量紧缩的方针，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发生的困难，招来一片叫唤声。当时，理论界也叫唤，有人危言耸听，说什么紧缩政策造成了多少亿多少亿国民收入的损失。地方、部门、企业，在周转的困难中，叫喊得更加厉害。于是银根全面放松，结果导致了后来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局面。我看，这类叫唤，这次也要起来，而且声音会越来越大，就看我们在这种压力面前是否动摇，能不能挺住了。如果挺不住，那么，1986年年初的故事就要重演，新一轮更加激烈的通货膨胀必将勃起，而且，由于没有抓紧时机对不合理的、低效的经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经济机体

* 原载《改革》1989年第2期。

的沉疴必将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中加重加剧，有可能演变为长期滞胀。那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要成功地在总量上坚持紧缩，就必须利用总量紧缩的时机，抓紧结构调整。上次紧缩方针之所以夭折，原因之一在于“一刀切”，没有同时抓紧结构调整。本来，经济紧缩时期，也是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西方市场经济通常也在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进行大的经济调整，大量淘汰经济中的肿胀、低效部分，那是自然淘汰的过程。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为什么不能利用当前紧缩的大好时机，对不合理的、肿胀的、低效的经济结构，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调整呢？

现在好像并没有人反对结构调整，讲结构调整的话也不少听见。但是人们对于结构调整要付出巨大代价、要承受巨大牺牲这一点，似乎认识不足，心理准备不足。要知道，不挤掉膨胀多年积累起来的大小脓包，不淘汰一大批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项目和一大批浪费能源、资源、低效、无效的企业，就不可能在总量紧缩的前提下，保证那些真正的有效供给和高效供给不致“滑坡”并能有所增长，进而优化生产结构，使之走向合理化、高效化的道路。总而言之，只有让该垮的垮掉，才能把该保的保住，该促的促上。不付出相当的代价，是难以成功地走出低谷的。但是现在似乎有一种心态，那就是：最好不要伤筋动骨，大家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中度过这个低谷。他们看不到繁荣中的浮肿和水分，不想触动那些肿瘤，特别是自己身上的肿瘤。这样哪能治好环境、整好秩序，走出低谷呢？现在需要的，是从上到下，都要树立一种认识，就是要准备度过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可以说是渡过一个难关，两三年内全民都要自觉承受紧缩带来的困难，包括实际生活水平可能暂时下降，共渡难关，这样，中央治理经济环境的决策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舒舒服服是过不去这一关的。然而，目前大家普遍缺乏这种意识，



不少人以为目前的困难只要磨蹭一下就能挺过去，这种心态很令人担忧。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对于治理和整顿，就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如社会集团消费，1988年计划压缩20%，实际执行结果比前年还增长了20%多。如果各项紧缩措施照此执行，整治的前景就很堪虞了。所以，舒舒服服过低谷这一心态，非改变不可。全民承受暂时牺牲准备共渡难关的意识，非树不可。

当然，总量上坚持紧缩，结构上抓紧调整，需要许多配套的政策措施，有许多操作性的具体问题要解决。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治理和整顿要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和韧性。如果上上下下都有此决心和韧性，对整治经济的重大意义有充分认识，对付出代价共渡难关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再加上政策措施配套对头，那么，经过两三年切实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中央提出的治理和整顿的任务，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

消除经济过热要加强和 改善宏观管理*

——《中国计划管理》杂志记者专访
(1989年2月)

从体制上来说,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并存时期,而传统经济体制中本身就存在需求扩张和投资饥渴,存在一种促使经济过热、增长过快的倾向。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时期,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为随着投资权力的下放,投资渠道的增多,从中受益的地方和企业,并未形成新的自我约束机制,还是软预算、大锅饭。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了经济过热的势头。加上社会集团消费膨胀,结果使社会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同时,造成经济增长过热也有宏观管理问题,还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我们在发展与改革方面,有些急于求成,改革要快,发展也要快。当然,每年工业发展计划指标并不高,但实际上超过很多。有人说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其实,如果我们在财政信贷和货币发行上,采取克制的紧缩方针,着眼于今后长期稳定的发展,还是能控制经济增长过热的。

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是有一些值得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的。

* 本文系《中国计划管理》杂志记者平鸿丰专访,发表于该刊1989年第2期。



比如说，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件好事，它可以促进我国从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促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这几年，乡镇企业已经吸收农业劳动力7 000万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乡镇企业发展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规模上大了一些，结构上也不尽合理，而且浪费大、技术差、效益低。如果我们一开始在宏观上能控制乡镇企业发展的规模，少转移一两千万人，在结构上给予合理指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更合理，更好一些。

还有，沿海地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正确的，但不宜一哄而起，应控制总的发展规模，做到适度发展。近两年我国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一些发达国家还高。这是不是恰当，值得研究。出口换汇是必要的，但我国原材料短缺，很多国内急需的物资，拿出去换外汇，这恐怕不一定合适。

总之，我们搞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也好，发展乡镇企业也好，方向是对的，但应同时注意控制发展规模和速度。这样才有利于改革与发展。

为什么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上总是急于求成呢？刘国光同志认为，这和我们不重视研究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不重视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有关。他说，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进展的经济环境，本来对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上比较一致，但近几年这个问题不被重视。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只能在紧张环境中进行，还有的同志宣扬“赤字财政”无害，通货膨胀有益。不能不认为这对宏观决策和宏观管理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年年喊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总需求，有时也确实在生产困难、资金紧张时，抓一下经济过热问题，但由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经济过热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现在，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是非常正确的，表明我们已经开

始重视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问题。这应当成为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

消除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在当前主要是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因为，对于原有体制上需求扩张的毛病，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是很快能奏效的。而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一个重要前提是要重新认识发展与改革的关系，确立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的方针。良好的经济环境，根本一点就是要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大体平衡。这应该成为治理、整顿的一个目标，因为改革只能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的环境中进行。

如何看待在治理、整顿中较多地采取行政手段问题，刘国光同志对此谈了他的看法。在治理、整顿中，为了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压缩社会集团消费，甚至为了冻结某些物价，中央政府就是要收回一些权力，较多地采取一些行政手段。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称之为“旧体制复归”。因为现在新的体制还未建立起来，间接控制手段基本上还不起多大作用，不采用行政手段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较多地采用一些行政手段，是为了稳定经济，为了给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改革的最终目的，也不是要完全废除行政手段。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些行政手段也还是必要的。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了冻结物价、冻结工资的措施。实践证明这个行政手段如果用得妥当，还是有效的。在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当前的整治阶段，我们就更不能排除行政手段。

当然，我们在利用行政手段时，要做到心里有数，同时要注意尽量采用经济手段，使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刘国光同志是主张尽量采取经济手段的。

如果把储蓄利率提高到物价上涨率之上，可以稳定消费者的心理，从而抑制消费，增加储蓄。贷款利率要相应提高，这可以



限制住一部分无效低效投资。因为现在的利率实际上是负利率，这等于鼓励大家竞相投资。利率提高以后，效益真正高的企业可以承受，而低效的、浪费的、靠投机倒把来生存的企业，则可以被淘汰掉一部分，从而把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向前推进一步。

如何保证治理、整顿能取得应有的成效问题有以下三点意见。

第一，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只靠提高利率不行，还要相应实行正确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实质就是鼓励或允许什么产业发展，不鼓励或不允许什么产业发展。因此，要按照产业发展序列，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由于我们目前的价格体系不合理，有的产业虽符合发展方向，但因行业性价格偏低，利率提高也可能危及这些产业的发展。所以，财政上还要采取如贴息等办法，支持这些产业的发展。

像挤脓包似的把低效企业挤掉，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都是通过萧条阶段，淘汰掉一大批企业，使产业结构得到强制性的调整。但我们害怕倒闭和失业。我们不能怕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在调整过程中，既没有企业倒闭，也没有人员失业，那么，恐怕很难调整好产业结构，很难提高宏观经济的效率。当然，在调整中，我们也要采取一些办法，如鼓励企业之间的兼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来解决倒闭和失业问题。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第二，正确认识我国目前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刘国光同志认为，总的来说，我国总供给不是不足，当然相对于需求来讲，供给确实是不足。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目前的需求是膨胀了的需求，是过度投资、过度消费造成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我国供给不足的结论。速度是表现供给的，我们的工业

增长速度，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几，够高了。所谓供给不足，一方面是需求膨胀造成的，另一方面供给结构上是有问题的。比如像加工工业搞得过多，楼堂馆所建了不少，而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跟不上去。因而在调整结构时，就要压缩无效供给或低效供给，同时要努力把资源用到有效的短线产品中去。由于发展速度太高，超过我们资源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提倡增加总的供给，那等于要加热已经过热的经济。反之，总的供给要压缩，发展速度也要降下来，这样才有可能调整结构，增加真正的有效供给。

第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方针，不能一遇困难就退缩或者是怀疑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恐怕至少要花两年的时间，而现在实行紧缩的财政信贷政策，已经发生资金周转困难。1989年上半年，问题可能会更严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挺住，要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调整方针。不能像1986年那样，先是实行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一旦遇到困难，地方、部门、企业哇哇一叫，就马上统统放开，结果导致形成今天通货膨胀加剧的局面。

我们应当有思想准备，因为我们也许要度过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渡过一个难关，全民要忍受紧缩带来的困难，共渡难关，舒舒服服是过不去这一关的。然而，目前大家普遍缺乏这种意识，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正确的方针，抓紧进行经济调整，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度过眼前的困难时期，迎来能够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改革的经济环境。

私有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

——《半月谈》记者专访

(1989年2月)

私有化是不是中国的出路？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谓“化”，即全面实行的意思。这样的私有化在中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我国过去是单一的国有化经济发展方向，小集体变大集体，大集体变国有，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这样。这无疑是一个僵化的经济模式。而我国今后所要建立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取向型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采取多种所有制混合结构比较适宜。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搞私有化，只能重蹈印度经济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覆辙，而我们知道印度经济是相当落后的，其发展比我国缓慢得多。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而且民主和法制还很不成熟，在这样的经济政治的格局下实行私有化，势必助长官僚资本即权力与金钱的勾结和相互转化。在我国，权力与官倒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无权力而有金钱的私倒，若不与权力结合，也难发大迹，即便不与大权结合也得与小实权结合，这样最终导致经济上的严重腐化，国家对整个经济失控。不要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无法建立，就是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也相距甚远。

其次，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家不掌

* 原载《半月谈》1989年第4期。

握一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在私有化程度较高的英、法等国，也不是将所有企业都私有，国家仍然掌握相当实力的资产。企业效率的高低，与所有制形式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足够的例子可以证明，只要管理得当，国营企业也可以同私有企业一样经营得很好。当然，国营企业有一些掣肘因素，企业背着许多经营以外的包袱，这都会影响它的经营效果。但私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的也不在少数。关键是要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使国有、私有、合作经济都能够各施所长。实际上在美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有相当部分的企业既非完全国有也非完全私有，相当部分的企业资产属于代表公众利益的民间组织所有。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各国政权的更迭，国有和私有往往是呈波浪状前进的，某个时期国有成分多一些，另个时期私有成分多一些，完全的国有化或私有化是没有的，也不大现实。

但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体制还需要向更多的市场取向型转化。在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我国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还很小，远远不够，还需要大发展。在现有2%多涉私经济成分的基础上，可以再发展一些个体、私营经济，大中型企业可以搞股份制，包括吸收民间股份。今后我国应当建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式，既有国有经济，又有集体、合作经济，还有个体、私营经济。在微观上，企业内部及企业与企业之间也是这样，有私有股，也有国有、集体股，社团股。企业间的联合，事实上已出现国有与集体的联合，集体与个体的联合，中外合资企业等。这才是大趋势。

经济形势、理论和政策*

(1989年2月)

为期四个多月的调整紧缩，已在某些方面初见成效，但从整体上看效果还不显著，离预期目标相距尚远。然而，已推出的调整紧缩措施似有疲软之势，不但企业因资金紧张^①而要求放松信贷控制，而且经济理论界也开始出现了“防滑坡”“反滞胀”的呼声，要求经济再一次“软着陆”。能否坚持已获初始效果的“治、整、改”方针，能否从根本上改变贪高求快的宏观指导思想，使改革和发展沿着“稳中求进”的路子走下去，不但对我们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且影响到从根本上突破“双轨制”的大步整体配套改革是否能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如期出台。我们认为，应当立足长远，认清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和供求管理相结合的既定策略，认认真真地搞好今明两年的调整治理工作，为制度创新式改革的大步推进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 系刘国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片形势分析小组的研究报告，由陈东琪根据讨论意见起草、刘国光修改定稿。

① 企业资金紧张并不是在1988年紧缩开始之后才出现的现象，而是由1988年7—8月份抢购以及居民对未来高通货膨胀的预期引起的。由于预期的作用，居民和企业都加速提款，以满足当前消费和进行实物储备，免受贬值之苦，这样，大量银行储蓄存款就转化成了居民手持现金，加剧了银行贷款资金的紧张；另一个原因是资金在银行外部的“体外循环”，而这也不是紧缩之后才有的现象。因此，不应把银行资金紧张归之于紧缩。